

大运河“世遗”框架与《纲要》框架涉及城市比较研究

丁煦诗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国大运河迎来了两个重要节点, 推动大运河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进入了新阶段。一是 2014 年中国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遗产“走出去”的标志性品牌。二是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行顶层设计, 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描绘了宏伟蓝图。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区域发展水平较高。但申遗成功以来, 也面临着遗产保护压力巨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空间挤占严重、合作机制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和困难。自中国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 其在实施、推进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规划和调整提供了直接参照。对中国大运河保护过程中形成的“世遗”框架和《纲要》框架中涉及到的城市进行比较分析, 不仅有助于做好相关研究、建设工作的衔接和延续, 也有助于大运河文化的顶层设计深入到发展不平衡和阶段性差异十分突出的“现实”中, 在文化引领城市和区域发展上发挥更好的示范作用, 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从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高度为人文城市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 同时也为文化建设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打开了重要通道。

[关键词] 大运河申遗; 大运河“文化带”; 城市比较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0)01-0046-07

中国有世界上最早和最长的运河, 一些运河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发挥着效益, 例如京杭大运河曾经是古代漕运的重要通道, 今天所实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也是以这条水道为主干。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它展开深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 全长近 3200 公里, 开凿至今已有 2500 多年, 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 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 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中国作为农耕民族, 农耕首先要依靠河流, 这也是中国与世界其它民族所不同的。在文化形态上农耕文明本质是河流文明, 有别于游牧文明, 也有别于西方的海洋文明, 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形态。^[1] 运河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力, 融合力。通过运河, 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 实现了南北文化的整合和兼收并蓄。^[2]

2014 年, 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 中国大运河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 这既是对中国人民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的认同, 又丰富了世界文化遗产宝库, 成为中国遗产“走出去”的标志性品牌。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运河功能持续发挥, 区域发展水平较高。但长期以来, 大运河也面临着遗产保护压力巨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空间挤占严重、合作机制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和困难。

在大运河申遗成功五周年的今天, 为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2019 年 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吹响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冲锋号角, 强化顶层设计, 推进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这对于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 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打造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

[收稿日期] 2019-11-22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全年实施情况评估和分地区实施绩效评估》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丁煦诗(1991—), 女, 河北定州人,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科学、文化战略、城市文化研究。

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中国大运河的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分析

近年来,关于中国大运河的研究,按照主题划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运河与沿线城市发展。熊海峰(2017)认为,大运河沿线城市发展水平梯度较大,应在支持上有所侧重。选择重点河段、重点城市等予以支持,然后“以点带面”,拉动区域整体崛起。^[3]王佳宁,孙静等(2018)研究指出,要促进顶层设计与局地试点有机互动,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应有为“定位”,而非被动的“守夜人”。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时,保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的统一。^[4]孙久文(2019)^[5]、沙勇(2018)^[6]等指出,将文化作为影响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来,是继长江经济带之后的又一个创新。通过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优化区域空间结构、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一个重要作用。

第二,大运河遗产保护。董卫,柴洋波等(2010)拓展出“文化网络”的概念,使生成于大运河流域的城乡网络、产业网络、景观网络与遗产网络成为大运河遗产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价值且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遗产体系。^[7]王晓(2016)认为要以整体性保护思路为指向,在强调遗产历史层积“原真性”和历史地区环境“完整性”前提下,使遗产保护行为能应对当代变化,实施“活态保护”。^[8]王莉莉(2018)提出通过贯穿协同保护、活化运河文化基因等方式增强大运河的文化认同感,以文化自信引领世界遗产保护路径。^[9]胡其伟(2019)以运河酿造业遗产为例,指出在保护传承方面应加大酿造业旅游开发力度,加强酿造文化研究,加大新媒体传播力度并把非遗保护与教育相结合。^[10]路璐,王思明(2019)指出要把握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的传承与重构、下沉与上升以及举国动员与深耕民意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化遗产走向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11]

第三,大运河文化。连冬花(2015)指出,大运河作为活态的线性文化遗产,文化类型种类繁多,实现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是必须突破的难题。^[12]谢光前(2017)认为,大运河作为中国历史变迁的大动脉,改变的不仅是运河沿线的自然生态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它借助“水”的力量,担当了一种社会变革和国家兴盛助推器的作用。^[13]周琪(2019)指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必须从历史维度、时代纬度和世界维度三个层面审视和把握。^[14]

第四,大运河与文旅产业优化。彭大松(2018)指出,应深入挖掘大运河城市的文化资源优势,将大运河文化融入城市发展之中,重点培育文化服务、商贸服务和旅游服务等行业,以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为契机,促进大运河城市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发展。^[15]王佳宁,孙静等(2018)提到,要探索大运河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协调推进、融合发展的路径,让大运河文化遗产融入沿线群众生活,惠及民生。^[4]孙久文,易淑昶(2019)倡导要实现以文化为资源的旅游产业优先发展,将文化资源的优势变为产业发展优势。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16]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遗产保护、文化遗产和产业发展等方面,而对大运河沿线城市群的探讨较少。中国大运河不仅有漫长的河道,无数的码头、船闸、桥梁和堤坝,同时也形成了由北京、天津、沧州、德州、聊城、济宁、开封、洛阳、徐州、淮安、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城市构成的城市群。城市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创造与传播的中心。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础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区域文明、不同城市、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对话。^[17]运河沿线城市不是彼此无关或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而是基于大运河水运交通和高度相似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具有明确层级关系及分工协同机制的城市共同体。^[18]

以大运河城市群为总体框架建构运河城市文化共同体,对相关城市共同的发生机制、历史源流、人文精神和价值谱系进行学术梳理与现代阐释,推动运河城市形成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在实践中保持战略及发展步调的一致与协调。能够在保护大运河世界遗产“完整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实现运河沿线城乡的共同繁荣和高质量发展。

二、大运河“世遗”框架与《纲要》框架涉及的城市比较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受到高度重视。从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2019年2月印发的《纲要》,是进一步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进行顶层设计,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描绘了宏伟蓝图,引起政界、学界和民间的广泛关注。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把文化城市群作为运河城市共同体的发展目标,转变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大力培育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的协同发展机制,是推动运河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走向复兴与新生、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目前,关于中国大运河建设主要形成了两个框架,其一是 2014 年的“世界遗产”(简称“世遗”框架),其二即 2019 年的“文化带”(简称《纲要》框架)。一方面,这两个框架的内在联系十分密切,前者最核心的运河文化保护和传承,也是后者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前者五年来在实施、推进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也为后者的研究、规划、调整和布局提供了直接参照。另一方面,两者也有明显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对象和范围上“多和少”的变化,也表现在主题和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差异。对两个框架的异与同、主要变化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做好相关研究、建设工作的衔接和延续,也对下一阶段的保护传承并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和指导意义。将《纲要》中涉及的城市与范围,与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时的城市与范围作对比,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涉及城市与范围

省份	城市	遗产名称(河段、遗产点等)	省份	城市	遗产名称(河段、遗产点等)
北京	北京	通惠河北京旧城段、通惠河通州段	安徽	淮北	通济渠淮北段
天津	天津	大运河天津段		宿州	通济渠宿州段
河北	沧州	南运河沧州段	江苏	宿迁	中河宿迁段
	衡水	南运河衡水段		淮安	淮扬运河淮安段
山东	德州	南运河德州段		扬州	淮扬运河扬州段
	聊城	会通河临清段、阳谷段		常州	江南运河常州城区段
	泰安	戴村坝		无锡	江南运河无锡城区段
	济宁	会通河微山段、南旺枢纽段;小汶河		苏州	江南运河苏州段
	枣庄	中河台儿庄段	浙江	嘉兴	江南运河嘉兴段
河南	安阳	永济渠(卫河)滑县段		湖州	江南运河頔塘故道、南浔古镇
	鹤壁	永济渠(卫河)浚县段、浚县黎阳仓遗址		杭州	江南运河杭州段
	洛阳	洛阳回洛仓、含嘉仓遗址		绍兴	浙东运河绍兴段
	郑州	通济渠(汴河)郑州段		宁波	浙东运河宁波段
	商丘	通济渠(汴河)商丘南关段、夏邑段			

表 2 2019 年《纲要》涉及城市与范围

省份	城市	核心区	省份	城市	核心区
北京	北京	朝阳区、通州区	河南	濮阳	南乐县、清丰县、台前县
天津	天津	武清区、北辰区、河北区、红桥区、南开区、西青区、静海区		安阳	内黄县、汤阴县、滑县
河北	廊坊	香河县、霸州市、文安县		鹤壁	浚县
	沧州	青县、新华区、运河区、沧县、泊头市、南皮县、东光县、吴桥县		新乡	卫辉市、辉县市、凤泉区、牧野区、卫滨区、红旗区、新乡县、获嘉县
	衡水	阜城县、景县、故城县		焦作	修武县、武陟县、博爱县
	邢台	清河县、临西县		洛阳	洛龙区、西工区、老城区、瀍河回族区、偃师市
	邯郸	馆陶县、魏县、大名县		郑州	巩义市、惠济区、金水区、中牟县
	雄安新区	雄县、安新县		开封	龙亭区、鼓楼区、顺河回族区、禹王台区、祥符区、杞县
山东	德州	德城区、武城县、夏津县		商丘	睢县、宁陵县、睢阳区、梁园区、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
	聊城	临清市、茌平县、东昌府区、阳谷县	安徽	淮北	濉溪县、烈山区、相山区
	泰安	东平县		宿州	埇桥区、萧县、灵璧县、泗县
	济宁	梁山县、汶上县、任城区、嘉祥县、鱼台县、微山县			
	枣庄	滕州市、薛城区、峰城区、台儿庄区			

省份	城市	核心区	省份	城市	核心区
江苏	徐州	沛县、铜山区、鼓楼区、贾汪区、邳州市、新沂市	浙江	嘉兴	秀洲区、桐乡市
	宿迁	宿城区、宿豫区、泗阳县、泗洪县		湖州	南浔区、德清县
	淮安	淮阴区、清江浦区、淮安区、洪泽区、盱眙县		杭州	余杭区、拱墅区、下城区、江干区、萧山区
	扬州	宝应县、高邮市、江都区、广陵区、仪征市、邗江区		绍兴	柯桥区、越城区、上虞区
	镇江	京口区、丹徒区、丹阳市		宁波	余姚市、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北仑区、镇海区
	常州	新北区、钟楼区、天宁区、武进区			
	无锡	惠山区、梁溪区、新吴区、滨湖区			
	苏州	相城区、虎丘区、姑苏区、吴中区、吴江区			
合计			150		

如上表所示,在省级行政层面上,《纲要》框架与“世遗”框架保持了一致,大运河主河道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 8 个省(市),共计 150 个县、市、区。按城市层级分,其中,直辖市单元 2 个(北京、天津)、副省级单元 3 个(雄安新区、杭州、宁波)、地市级单元 46 个(涉及直辖市的区,划归地市级)、区级单元 70 个、县级单元(含县级市)71 个。按省级行政区拥有的核心区数量划分,依次为河南 40 个、江苏 37 个、河北 21 个、浙江 18 个、山东 18 个、安徽 7 个、天津 7 个、北京 2 个,它们既是历史上中国大运河的主要空间范围,也是今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支点。

在地市级及以上的城市数量上,“世遗”框架为 27 个城市,《纲要》框架为 37 个,后者比前者多出 10 个,分别是河北省的廊坊市、邢台市、邯郸市和雄安新区,河南省的濮阳市、新乡市、焦作市和开封市,江苏省的徐州市和镇江市。这说明在中国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以来,特别是 2017 年大运河文化带规划编制启动以来,原来一些对此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处在观望状态的运河城市积极行动起来,为实现更完整、更全面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增加了生力军。

与经历过申报“世界遗产”历练、前期各方面支撑条件都比较好的“世遗”框架城市相比,在《纲要》框架中新增补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运河沿线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其中河南段更是占到了全部城市的近四分之一。中国大运河在拉大自身框架的同时,也增大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担子。对新增城市文化资源及保护传承利用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对于客观把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不充分和不协调问题,研究和建立科学的协作和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十分必要和重要。

与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时对比,《纲要》框架主要增加的城市和区域的运河概况如下:

1. 大运河河北段增加城市及其资源情况

《纲要》框架中大运河河北段增加了 3 个地级市,分别是廊坊市、邢台市、邯郸市和 1 个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河北段特色鲜明,20 世纪 60 年代断航后,运河形态、面貌基本保留,遗存丰富。河北段运河沟通京津能够形成京津冀文化纽带,还可恢复南运河通水通航,形成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文化纽带。

廊坊与京津同步治理北运河,目前成效显著。香河已完成运河文化公园建设并对外开放,新增绿化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北运河香河段生态综合整治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下一步将加快推进生态驳岸、安运桥核心区景观、滨水景观带等工程建设并启动二期工程建设。香河县还编制了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进一步打造串连千亩紫薇园、荷花小镇等精品景观旅游线路,实现运河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和美丽乡村游的有机结合,北运河生态文化体验带正在成为香河旅游新亮点。

大运河河北段沿线的遗产类型多样、分布广泛、体量巨大、文化价值高,具有多样性及复杂性的特征。对于有形的物质遗产而言,大运河文物本体、两岸地上文物遗存和重要遗址遗迹的保护是重中之重。为进一步摸清早期运河遗址、白洋淀与大运河连通部分区域文物遗存状况,2018 年河北省文物局加大河北段大运河遗产研究保护力度,安排邯郸市、邢台市进行永济渠遗址勘探试掘。省文物研究所进行了大清河流域文物资源调查、考古勘探工作。^[19]

2. 大运河河南段增加城市及其资源情况

《纲要》框架中大运河河南段增加了 4 个地级市,分别是濮阳市、新乡市、焦作市和开封市。是与大运河“世遗”框架相比增加地级市数量最多的省份。

濮阳境内大运河全长 42.7 公里,流经清丰、南乐和台前县等 3 个县,是河南省唯一一个同时拥有隋唐大

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城市。2018年4月,在河南省文物局的主导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濮阳台前县相关部门对台前县境内的京杭大运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依据文献记载对大运河河道及其相关遗迹进行了考古勘探。位于河南东北角台前县境内的京杭大运河曾流淌了600多年,只不过最后因河道淤积而废弃。最新考古成果显示,在台前县发现并确认了南从山东省东平县十里铺村进入,向北进入山东阳谷县张秋镇,且已经淤没于地下的会通河古河道,而会通河古河道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台前段大运河全长约10公里,直线长度只有8公里,虽短,但十分重要,因为这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和关键河段。

大运河新乡段即如今的卫河新乡段,是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使用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卫河隋代以前称“清水”,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挖永济渠。隋唐称“永济渠”,北宋将永济渠更名为御河,到了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又改御河为卫河,此后卫河之名不再更改,沿用至今。

与焦作市有着种种关联的隋唐大运河永济渠遗迹,最终因焦作市找不到关键物证,与中国大运河申遗失之交臂。据史料记载,焦作是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起点段,到明代时称之为卫河(与今卫河相当)。明清两代,卫河漕运发达,北京城内所需物资,很多经卫河抵京。另据史料推定,永济渠渠首及其河道应在武陟县境内的沁河河道处。然而,由于武陟县境内的永济渠河道在唐末已经废弃,史书记载较少,渠首及河道的准确位置难以确定。^[20]

古汴河,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是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历史上古汴河流经汴州(开封)、宋州(商丘)、宿州、泗州(盱眙境内),而只有开封以“汴”作为城市名,足见汴河对开封的影响和开封的地位重要性。古汴河随着北宋的灭亡而逐渐淤塞,此后,汴河沿岸的城市没落,至今都没有再次兴起。目前,开封市境内已发现的汴河故道全长约80公里,由于数遭战乱和水患,大部深埋地下达7—9米,但仍有10多公里故道与今天的惠济河重合。开封留下了众多运河遗址,如北宋东京城遗址东水门遗址、东角子门遗址、西角子门遗址、西水门遗址、新郑门遗址、虹桥遗址等。

历史上的水患、战乱、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等是造成大运河河南段衰落的主要原因,此次《纲要》框架将这4个重要运河城市纳入,不仅补足和丰富了中国大运河的完整框架,同时对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也具有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

3. 大运河江苏段增加城市及其资源情况

《纲要》框架中大运河江苏段增加了2个地级市,分别是徐州市和镇江市。

徐州蔺家坝—淮阴—扬州邗沟被称作苏北运河,全长404千米,纵跨徐州、邳州、宿迁、淮阴、扬州等11个县市,沟通了微山湖、骆马湖、洪泽湖、高邮湖等水系,是京杭运河上运输最繁忙的河段。基本建成二级航道,成为京杭运河上等级最高的航道,常年可行驶2000吨级的船舶。当前有苏、鲁、沪、浙、湘、豫等十多个省市的船舶航行其中,年货运量可达3亿多吨。徐州段最大通过量已达5500万吨船舶吨位,其中货物通过量达3500万吨。

扬州六圩口—镇江谏壁—常州—南谏,全长224千米,贯穿江苏的扬州、常州、镇江、无锡、苏州等县市,沟通了长江、太湖水系,与上海、浙江等周边地区的省际河流相连。当前有苏、鲁、皖、沪、湘、鄂、川等13个省市的船舶在该段运河上航行。截至2010年,航道全部达到四级标准,可通航500吨级船队,年货运量已超过1亿吨,超过江苏境内长江航道的运量,相当于沪宁铁路单线货运量的3倍。航行船舶的密度超过了德国的莱茵河,是京杭运河上运量最大,密度最高的河段之一。

总体上看,《纲要》新增的10个城市尽管资源存储情况、保护传承利用水平参差不齐,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直接影响到其在运河文化建设上投入等;二是保护传承意识觉醒较晚,在运河文化研究、规划和布局上缺乏相应积累和准备;三是目前都在急起直追,特别是需要对标《纲要》框架提出的建设任务和要求,未来的各种压力也会比较大。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城市都可以看作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继续弥补的“短板”,同时也是《纲要》在具体实施和整体推进过程中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群体。

三、《纲要》框架涉及城市增多的原因分析

党的十九大做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大部署,为将大运河打造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文化品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发挥大运河连线织网、融汇交流的重要作用,借势借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提

供了难得的时代契机。建设运河文化带,要努力做到既契合运河沿线遗产特征,也便于整合运河遗产建设要素,形成整体发展态势,以发挥运河遗产的先发优势和集成优势,发展壮大运河文化生产力。《纲要》涉及地区增多的原因分析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大运河时空跨度长,地域面积广,遗产类别多,文化价值高,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涵,承载着丰富的时代价值。《纲要》增加的10个城市,都是有史料可查或有遗迹可循的大运河河段沿线城市。丰富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研究,能够加强大运河所承载的丰厚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更详尽地进行挖掘和阐释,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推动大运河文化与时代元素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有利于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活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弘扬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从不同层次和角度深入理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突出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

第二,有利于优化运河文化带的空间布局。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构建一条主轴带动整体发展、五大片区重塑大运河实体、六大高地凸显文化引领、多点联动形成发展合力的空间格局框架。根据大运河文化影响力,以大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近使用的主河道为基础,统筹考虑遗产资源分布,合理划分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清晰构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空间布局和规划分区。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河道水系治理管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创新保护传承利用机制等,在更加全面的大运河沿线城市和区域框架下,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河道水系资源条件改善、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文化旅游融合提升等工程,加强精品线路和统一品牌建设、促进运河文化高地繁荣兴盛。

第三,有利于促进区域创新融合协调发展。《纲要》涉及的沿线城市和核心区,可以更加有效地衔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等战略实施,加快发展绿色航运。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生态、航运资源,发挥大运河连线织网、融汇交流的重要作用。大运河是贯通南北的文化长廊,也是联系不同区域的重要经济动脉和生态廊道,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生态、航运资源。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紧密结合国家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统筹大运河相关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推进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第四,有利于展示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大运河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壮美和辉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纲要》倡导让更多运河沿线城市参与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来,协调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能够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重要支撑。

第五,有利于深化国内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大运河自古以来就是全国各民族各地区交融互动的关键纽带,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地带,对国内外文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大运河文化带研究城市数量的增多,能够更加具体地对河段和遗迹本身进行保护和传承,深化大运河精神内涵,挖掘和弘扬时代价值,增强国际交流互鉴,再现大运河包容开放天然属性。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供重要平台。

综上,把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科学规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推动大运河沿线区域实现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张强. 运河学[M]//卞孝萱,胡阿祥,刘进宝. 新国学三十讲.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 [2] 张强. 运河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J]. 江苏社会科学,2010(5):228—234.
- [3] 熊海峰.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对策探析[J]. 中国国情国力,2017(10):43—45.
- [4] 王佳宁,孙静,王君也. 新时代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总报告——8省市基本态势、总体评估和趋势展望[J]. 人口与社会,2018(11):4—24.

- [5] 孙久文,易淑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中国区域空间格局重塑[J].南京社会科学,2019(1):11—16.
- [6] 沙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人口与城市发展研究[J].人口与社会,2018(11):25—32.
- [7] 董卫,柴洋波等.江南文明背景下的运河遗产保护[J].城市规划,2010(7):44—47.
- [8] 王晓.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问题研究[J].东南文化,2016(6):20—26.
- [9] 王莉莉.文化自信引领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18.
- [10] 胡其伟.运河酿造业遗产及其保护传承[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53—58.
- [11] 路璐,王思明.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现状、不足与展望[J].中国农史,2019(4):137—145.
- [12] 连冬花.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的路向考察[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18—122.
- [13] 谢光前.论运河文化与中国道路[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85—91.
- [14] 周琪.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三个纬度[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5—9.
- [15] 彭大松.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8):56—64.
- [16] 孙久文,易淑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中国区域空间格局重塑[J].南京社会科学,2019(1):11—16.
- [17] 刘士林.大运河城市文化模式初探[J].中国名城,2011(7):47—52.
- [18] 刘士林.中国大运河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J].中国名城,2015(1):24—27.
- [19] 龚正龙.河北省大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N].河北日报,2019—03—21.
- [20] 王玮萱.这次没“露脸”,实在是遗憾[N].焦作晚报,2014—06—23.

(责任编辑:闫卫平)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ities Related to the “World Heritage” and “Outline” of the Grand Canal

DING Xu-sh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Grand Canal has witnessed promotion of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into a new stage. First, in 2014, China's Grand Canal was officially included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becoming an iconic brand for Chinese heritage to “going out”. Second, in 2019,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utline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Plan*. *The Outline* designs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from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and draws a grand blueprint for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are rich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fast. However, since the success of the world heritage registration, it has encountered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such as heritage protection, poor quality of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severe situ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erious crowding of ecological space and urgent strengthening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accumula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former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provided direct reference for the planning and adjustment of the latt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ities involved in *The World Heritage* framework an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utline* not only helps to link up and continue relevant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work, but also help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Grand Canal culture to extend to the “reality”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prominent stage differences, which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demonstration role in guiding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culture,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ong the Grand Canal, and explores new path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provides a vast spa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ities and opened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enter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national economy.

Key words: Grand Canal world heritage application;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comparison of the cities